

# 当代东南亚 国际关系

马晋强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

主 编 马晋强

副主编 朱振明

张光平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马晋强编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2

ISBN 7-5012-1271-6

I. 当… II. 马… III. 国际关系-东南亚 IV. D8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9406 号

**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

**Dangdai Dongnanya Guoji Guanxi**

**责任编辑/罗养毅**

**封面设计/姚少春**

**责任出版/尧 阳**

**责任校对/王 铮**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甲 31 号 (010) 65265928**

**邮政编码/100005**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300 千字**

**版次印数/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 价/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序　　言

这本书是云南省专业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三家机构（云南省国际问题研究所、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和云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研究的一项成果。为各抒所长，相得益彰，本书在结构安排上采取以时间为序，从重大事件展开，按专题深入论述。

本书定名为《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当代”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现在的这半个世纪，“东南亚”是指亚洲东南部现有的10个独立国家，即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总面积约45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亿。

---

### —

这个地区原本并不叫东南亚。

这个地区录入古代史籍的名称叫“南海”（中国南方大海中的国家）。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称呼。自古对这个迄今已有两千年文明史的地区了解最深的是中国，

记载最详的是汉文史籍。中国西汉王朝时已开始称这个地区为南海，至唐代已成为通用名称。那时，欧洲对这一地区尚一无所知。名称毕竟是文化发展、文化交往和文化影响的一种反映。有的西方史学家把中国记录的有关史料称为研究古代东南亚的“无价之宝”。至清代，这一地区改称“南洋”——意为“南洋诸国”。此后，中国华侨出行或移徙该地区就统称为下南洋了。

东南亚这一名称，虽说在19世纪前半期西方偶尔也有人使用过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被广泛接受而通用则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即在1943年9月同盟国在锡兰（今斯里兰卡）成立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以后。显然，最初是一个战区名称，后来被地理学家认可，为各国接受。这一名称的变更所反映出的历史现实是，战后该地区国际关系的性质、内容、特点和发展方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本书重点讨论的正是东南亚国家战后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东南亚国家之间以及东南亚国家与世界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内涵、实质和特征；冲突与合作的基础、方式，相互影响、消涨和调节的规律；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国家对外目标意向、对外政策调整和对国际安全新概念的认知。

东南亚地域范围包括大陆半岛（“中印半岛”）、海洋群岛（“南洋群岛”）两部分，扼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运通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马六甲海峡

是一条生命线。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国家分别依附两大阵营，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关系是以冷战为主轴的世界国际关系的一个演示场，同时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反光区。6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多数国家采取了开放式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融入西方市场，经济快速增长，实力明显增强，国际政治地位显著提高，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有一种说法，称东南亚发展到本世纪90年代初，在亚太地区的位置已攀升至继中、日、美、俄之后的“第五极”。走向东南亚，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已经成了亚洲、美洲及至欧洲国家的共识。

冷战时期，东南亚在两大阵营角逐中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双方争夺尖锐。因而，东南亚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大国间关系的影响和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东南亚域内国家在两极阴影下进行的国家关系重新整合之复杂和激烈，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也是没有一个地区可与之相比的。

写这本书的最近一个动因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我们的触动。正当人们盛赞东亚奇迹时，猛然间于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波及韩国、日本，终于酿成了全球金融动荡。这场金融危机对近期和远期，对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的作用和影响成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 二

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像对历史领域其他问题的研究一样，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学习、领会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东南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遇到了不少新问题。

首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什么？

学者们已熟知，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也具有民族性；而统治阶级在生产关系里的支配地位，又决定了民族利益从属于阶级利益。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和认识苏哈托家族的利益与印尼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印尼民族国家的利益的关系？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要求清查苏哈托家族财产、审判苏哈托的呼声鼎沸，能否说印尼国家利益所具有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在那一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还有，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使阶级性与民族性统一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和统一的国家目标。那么又如何认识在东南亚却并非偶然地发生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波尔布特政权并酿成中越边界战争的事件？

第二是国际关系史的分期问题——近代国际关系始于何时？

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商品资本关系的加强，贸易的扩

大，交通的便利，世界逐步成为一个整体，由是形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应与世界近代时期的开端相一致。

对此，我们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想提出来以供讨论。我们认为，也许可以把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前推至新航路的开辟。

新航路的发现和西方先进国家进行的环球远征，在进行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同时，开始把世界连成一片。它打破了世界的隔绝状态，中断了落后地区和国家的孤立、消极、缓慢甚至停滞的历史发展进程。它把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逐步卷入到了由商品和资本构筑起来的交往网中。世界第一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许可以从这个时候算起。

一位日本学者把“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势力均衡政策”定为近代国际关系赖以存在的三大基石。近代国际关系的这些基本特征在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就已经出现了。

西方殖民主义者到达东南亚始于 16 世纪初新航路的发现。瓦斯科·达·伽马绕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达印度新航路的开辟使葡萄牙殖民远征船队于 1511 年 4 月 20 日首次到达马六甲。弗迪南德·麦哲伦穿南美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新航路的开辟使西班牙殖民远征船队于 1521 年 3 月 16 日和 11 月 18 日先后登上菲律宾群岛和马鲁古群岛。新航路的开辟以及随之而来的葡、西、荷、法、英对东南亚的殖民扩张，打破了这一地区国家的孤立

状态，中断了这一地区国家停滞的、消极的独立发展道路，把它们卷入了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涵的近代国际关系之中。

第三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东方殖民地与西方宗主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归纳他对印度问题的意见时明确指出并集中阐述了以下观点。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又说英国的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破坏了印度农业和手工业家庭结合的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双重使命”的重要论断就是我们认识和评价东方殖民地与西方宗主国关系的理论依据。

殖民主义者的东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人民不堪忍受的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上又加了一重资本主义的奴役。殖民主义一词在亚洲人心目中几乎是一个罪恶的代名词。马克思也尖锐地批判过殖民主义者的伪善、卑鄙、背信弃义、野蛮、残暴、屠杀……但这并不是马克思锐意阐发的“双重使命”（包括破坏性使命）的旨意所在。马克思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

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 第四是国际关系主体的漂移。

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分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是基本行为体或行为主体。

在东南亚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又有两种突出的现象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一是有的集团或个人尚未执政却已开始作为主体在活动；二是有的集团或个人虽已下台但仍能继续作为主体进行活动。也就是说，有的集团或个人在不能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的时候却能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承担者或执行者进行活动。我们把这种作为主体承担者或执行者的集团或个人与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分离现象称为国际关系主体的漂移。

### 三

对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叙述：战后初期，主要讨论殖民主义重返东南亚所造成的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分化与重组；60年代以后，主要沿越南战争、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建立和柬埔寨问题这三条线讨论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90年代，主要讨论冷战后东南亚国际关系新的调整以及东西亚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既照

顾全面，也突出重点。

二次大战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动荡、分化、战争、和平以及重新组合都反映出各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大国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大小也是与该大国的实力地位相当的。实力（也有人把它发展了，称为“战略力量”）地位的变化是国际关系变化的基础，实力地位的变化往往先于国际关系的变化。

冷战时期，在东南亚国际关系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是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就已作了控制东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准备，提出结束殖民主义，实行“国际托管”。美国还对自以为仍是“主角”的英国施加压力，要它放弃“帝国特惠制”。二次大战使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兵工厂”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急剧增长。美国认为自己是“经济世界的巨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和空军，还垄断着原子弹，高踞于世界力量的顶峰，世界秩序应按照美国的意愿来建立。美国不让苏联插手战后对日本的占领，也拒绝让它在太平洋地区分享权力。作为盟国远东司令和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949 年就宣称：“现在，太平洋已变成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内湖，我们的防线贯穿亚洲沿海一连串的群岛。”<sup>①</sup>

美国向东南亚扩张势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遏制中国。二战中，美国把中国视为美国的盟友，把中国列入维

<sup>①</sup> 转引自 [美]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28 页。

持世界秩序的“四个警察国”之一。但在二次大战结束时，中国发生乾坤变化，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一边倒”倒向苏联，打破了美国醉心的如意算盘。朝鲜战争又加剧了中美两国的对立。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通过援助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来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决心在南越建立进攻中国的桥头堡，通过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以形成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直言不讳地说过，美国在越南进行战争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

美国向东南亚的扩张得益于东南亚国家对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这是美国得以在东南亚挥舞指挥棒的一个基础。原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独立后仍继续同美国关系密切。泰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幸免于被视为战败国并加入联合国的。菲律宾倡议召开马尼拉会议，牵头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泰国积极支持，愿在曼谷设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总部，愿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南越，更是离开美国就活不下去。一些在战后初期采取积极中立政策的东南亚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后也向右转。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再加上法国殖民者重返印度支那引发的印支战争造成的现实威胁，使这些国家都希望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伞。

相比之下，西欧老殖民主义国家，有的已撤出了东南亚，有的虽与一两个国家保持有防务合作关系，但已力不从心。美国主动填补了老殖民主义撤退后在东南亚留下

的力量真空。

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程度的加深，越南战争的升级，使东南亚各国之间相互敌对的倾向更加明显，地区安全对大国的依赖性也更加突出。

与美国具有同样领袖欲的苏联，战后初期几乎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对战略重点地区欧洲的争夺。苏联领导人嘱托中国多在亚洲发挥作用，因为毛泽东式的革命的“基本道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和作用是苏联起不到的。苏联对亚洲这样放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与美国相比，还属力量较弱的一方，摊子不能铺得太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苏联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一样具有一种偏见：前者把“民族主义”、“中立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混为一谈，而后者把“民族主义”、“中立主义”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所以战后初期，当美国积极主动卷入东南亚填补力量真空时，苏联对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却显得有点冷漠。战后初期，在东南亚被视为亲西方的国家中，即后来组成为东盟的国家中，只有招致美国敌视的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与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就是由阵营旗帜鲜明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于1945年9月宣布独立并同时宣布建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也是在中国正式承认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的1950年1月才与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苏联加强对越南的援助，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攻势，把东南亚纳入它的全球总体战略中加以考虑，是在

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这时，苏联亚洲战略的主要目标已不是与美国对抗，而是包围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所要寻找的已是反华盟友了。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就是要在亚洲建立反华同盟。这一点，东南亚国家也是明白的。因此，多数东南亚国家对此表示冷淡，特别是在中美改善关系之后，就转而谴责和抵制莫斯科精心策划的所谓“亚安体系”了。

在中苏发生分歧以前，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一直是“一边倒”。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sup>①</sup>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就是遵循这一方针发展和加强的。中国依据两大阵营的理论，追求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发展社会主义力量，以改变东西方力量的对比。美国要包围中国，中国要打破美国的封锁，美国与越南的战争透视出的是中美对峙。

越南战争的升级，使东南亚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热点，也使东南亚各国在对外关系上无法摆脱集团对抗的结构性影响，被卷入国际冲突的阴影之中。中美对峙、中国与越南的阵线关系使中国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与东南亚多数国家处于对立状态。东南亚多数国家完全倒向美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2 页。

国一边。菲律宾和泰国首先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积极参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几乎断绝了与中国的一切直接交往。

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对外关系中一直居于仅次于美国的地位。所以如此，除冷战的原因外，还有以下5个与东南亚国家利益关切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台湾的贸易和投资利益；二是华侨问题——华商的财富和中国对华侨的影响问题；三是共产党问题——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队是否受中国支持的问题；四是南沙问题——向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提出挑战；五是东南亚国家间政治、领土的纷争问题——中国如何表态。围绕这些问题出现的矛盾、冲突乃至尖锐对立，使东南亚某些国家曾把中国视为是对它们安全的“威胁”。

中国与东南亚多数国家，特别是与东盟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在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霸权主义进行军事反击之后。新加坡的李光耀说：“不管怎么说，中国越境教训越南时，东南亚国家从中国的干涉中是得到好处的。”<sup>①</sup>在美国从东南亚实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东盟国家把中国视为它们实行大国平衡外交的最重要的平衡制约因素之一。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期，重组国际实力格局的平行四边形。东盟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事变，提出并逐步实施了一个东南亚10国一体化

<sup>①</sup> 陈杰：《新加坡外交——其生存之道》载《东南亚研究》1988年第1期。

的“大东盟”战略，东南亚的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调整，重新组合的新时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多边经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以往，东盟国家的多边经济合作多停留在会议和声明上，有名无实。进入 90 年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浪潮的推动下，东盟国家通过建设增长三角区和自由贸易区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西欧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一种应付手段，东盟也要建立自己的贸易区。”<sup>①</sup>当然，自 60 年代以来，东盟国家迅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为东盟国家经济一体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盟国家的政治合作也由主要应付外来的冷战背景下形成的制度、意识形态的威胁转为主要协调内部的利益关系和对外的态度立场。1992 年举行的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决定将以往不定期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制度化（每 3 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议）、经常化（两次正式会议之间将举行非正式会议），使它能更好地协调各方立场，更有效地处理成员国内政与外交的重大问题。

冷战后，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力量的收缩使以往主要依赖美国保护伞的东盟国家产生了安全危机感，导致东盟各国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不断扩充军备，加速实现军事现代化，频繁举行以南海为背景的联合海、空军演习，

<sup>①</sup> 赵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07 页。

建立以多边对话为主要形式的安全论坛——“东盟地区论坛”，积极寻求构筑一种新的安全体系。这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建立一种对本地区安全具有积极意义的安全机制和体系，必须要摒弃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构想，必须要具有一种新的安全观念，寻找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条新途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庆祝东盟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是全球和地区安全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经贸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这是全球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各国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这是确保和平与安全的现实途径”。在谈到中国与东盟关系时，钱其琛说，近10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升到了新的水平”，“中国与东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利在双方，惠及亚太”。